

# 中國古代

## 女權的探討

范清宏

對於中國古代女權的探討，歷來注意到這方面的史家不多，胡適在「中國章回小說考證」一書中指出：「鏡花緣」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書，李汝珍所見的是幾千年來忽略了的婦女問題，他是中國最早提出這個婦女問題的人，他的「鏡花緣」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。

### 自古忽視婦女問題

李汝珍是清朝乾隆年間的人，中國幾千年來的婦女問題，一直到清朝才有人注意到，可見女權問題在古代被忽視的程度。

李汝珍透過「鏡花緣」這本書，寫出他心目中，婦女應有的社會地位。胡適說：

李汝珍述武則天創建男女平等的選舉制度。他說選舉制度，不單是一兩個女扮男裝的女才子混入舉子隊裡考取一名科第。李汝珍的意識在於要求一種制度，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樣用文學考取科第。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沒有上官婉兒和李易安，只是缺乏一種正式的女子教育制度；並不是沒有木蘭和秦良玉，呂雉和武則天，只是缺乏一種正式的女子參政制度。一種女子選舉制度，一方面可提倡女子教育，一方面可引到女子參政。所以李汝珍在黑齒國說的也是一種制度，在武則天治下說的也只是一種制度。這真是大胆而超卓的見解。

其實，李汝珍的見解再大胆再超卓，只是他的幻想，古代的社會並不是這

樣的。

薩孟武在其「中國社會政治史」一書中說：

詩大雅生民之章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，謂后稷「即有邰家室」……后稷及契未必為帝嚳之子，有娥氏之女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，有邰氏之女姜嫄踐巨人之迹而生棄。即契及棄均為無父之子，此乃母系氏族的現象。

又說：

晉郭璞纂山海經圖讚，其「海外南經圖讚」中載有「女子國」，謂「簡狄有吞，姜嫄有履，女子之國，浴於黃水，乃娠乃字，生男則死」。這固然是神話，而「女子之國」四字亦可表示殷在契時，周在后稷時，屬於母系氏族，其後進化，才演變為父系氏族。

### 上古母系氏族沒有政治地位

這番說詞，很能代表支持中國上古史的早期屬於母系氏族的史家看法。然而，這個時期就算屬於母系氏族，却無明顯證據顯示女權高於男子或與男權相持。

到了春秋戰國，儘管九流十家，百家爭鳴，使這個時期的文化思想大放異彩。但從現有的史料，可以發現思想家、學問家當中，竟無一個是女性，由此推論當時的教育風氣，雖然很蓬勃，女子却未能享受。尤其管仲的尊王攘夷之口號，更暗示女性在政治上無地位可言，所尊之王，所攘之夷，是以男性為對象。

不過，這一時期的女性，在生活的空間上，顯然比此後二千年的女性來得大，行動也自由多，從詩經上的記載，她們可以公開的談情說愛，從史記上的記載，女性在商場上，甚至不遜於男性。

史記貨殖列傳中說：

巴寡婦清，其先得丹穴，而擅其利數世，家亦不訾。清，寡婦也，能守其業，用財自衛，不見侵犯，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，為築「女懷清台」……清窮鄉寡婦，禮抗萬乘，名顯天下，豈非以富邪？

在那個階級分明，職業世襲的環境下，巴寡婦仍能與以男性為主的同業一爭長短，並還壓倒他們，亦可見女子的社會活動不全然限制在閨房內。

## 漢武帝殺傷婦女的社會地位

真正改變婦女社會地位的開始，可能在漢朝，尤其在漢武帝之後更加明顯。武帝主張獨尊儒術、罷黜百家，其背後固然有其他的政治目的，但對女權而言，却構成嚴重的殺傷力。

儒家對女性的要求是「女有歸」（禮運大同篇），對女性的地位是「幼從父兄，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」（禮記郊特牲），總之，女性附屬於男性之下，一切聽命於男性。這種觀念，在春秋、戰國並未受到明顯的遵行，而武帝的獨尊儒術，使這種觀念，水漲船高。

我們看武帝之後約一百多年的班昭（班大家）所寫的「女誡」七篇，在她這連同序言共一千六百字的內容裡，完全否定了女權，並且以女人無權乃天經地義的事，這種觀念竟然成為女性此後將近一千八百年的「範本」，對中國女權的發展，構成最嚴重的殺傷力。

## 「女誡」是女權發展的桎梏

「女誡」開宗明義的指出，女人天生的地位就比男人低。她說：「古者，生女三日，臥之床下……明其卑弱，主下人也。（卑弱第一）。

她又強調女人以弱美：「陰陽殊性，男女異行，陽以剛為德，陰以柔為用；男以強為貴，女以弱為美。鄙諺曰：『生男如狼，生女如鼠，猶恐其虎。』（敬慎第二）。

女人不能生得有如「母老虎」，因為女子以從夫為要，班昭說：夫有再娶之義，婦無二適之文，故曰：夫者天也。

因此，天固不可逃，夫固不可違，行違神祇，天則罰之；禮義有愆，夫則薄之，故事夫如事天，與孝子事父，忠臣事君同也。（夫婦第二）。

此外，她認為夫婦的結合，對妻而言，是夫給她「恩德」，即使夫如何的薄倖，妻子不能有怨言，因為，妻子是受夫的厚恩，怎能恩將仇報，這種觀念，在女誡的曲從第六，更有淋漓盡致的述說，茲不贅言。

女誡的思想，無疑是女權發展的桎梏，但對有野心的女人而言，她們在女誡規範的壓力下，想在政治舞台上與男人一爭長短，只有採取變通的垂簾聽政方式，所謂垂簾聽政，其實就是一種政治遙控的手段，她們很少能夠公開露面，毓冕朝服，號令百官，而她們的身分多限定在外戚集團，既無法如男子揭竿起義，也無法如男子由科舉、選舉、拔擢之途平步青雲，她們一旦有掌權的機會，只不過是適逢以男人為中心的政治發生青黃不接的情形，這種機會畢竟是罕有，在正常的政治體系，根本就沒有她們的份。

## 太后臨朝稱制為尊

在女誡思想前三百年左右，女權所受的束縛不大，漢高祖劉邦的太太呂雉，以太后之尊臨朝，號令天下，稱制為尊。司馬遷在史記中，對她譽多於毀，尤其將她列入本紀，本紀是記帝王，等於承認她的「帝位」。對她的評語則是：

孝惠皇帝，高后之時，黎民得離戰國之苦，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，故惠帝垂拱，高后女主稱制，政不出房門，天下晏然。刑罰罕用，罪人是希。民務稼穡，衣食滋殖。

這段話明明白白的指出，呂雉以一名女人治國，政績並不差。而唐朝的司馬貞，在索隱贊述中，則持相反的意見，純粹就呂后的人品，對她做人身攻擊：

高祖猶微，呂氏作妃，及正軒掖，潛用福威。志懷安忍，性猜疑。置鸛齊悼，殘殺戚姬。孝惠崩殯，其哭不悲。諸呂用事，天下示和。大臣蒞臨，支壁戈夷。禍盈斯驗，蒼狗為畜。

從這段話當中，可以看出兩個不同時代的人，對女人治國的不同看法，也反映出兩個不同時代的女權見解，如以女誡的推出為分界，更可了解其中顯著



圖右：武則天首任丈夫——唐太宗李世民的像，為唐人畫師之作。  
圖左：後人所繪的則天皇后武氏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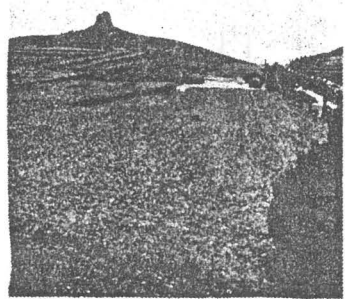
的差別。

在女誠推出之後的東漢，可說是中國歷史上，母后臨朝最蓬勃的時期，她們在政治系統上，雖屬於最高決策者，但在傳統的限制上，統御能力有所不足，不得不援引外戚自保，造成中國史上最鮮明的外戚之禍，影響漢祚，塗炭生靈，莫此為甚。

後漢書后紀（上）說：

自古雖主幼時艱，王家多寡，必委成家宰，簡求忠賢，未有專任婦人，斷割重器，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，故穰侯權重於昭王，家富於贏侯。漢仍其舊，知患莫改，東京皇統屢絕，權歸女主，外立者四帝（安、質、桓、靈），臨朝者六后（竇太后、鄧太后、閻太后、梁太后、竇太后、何太后），莫不定策幃帟，委事父兄，貪孩童以久其政，抑明賢以專其威，任重道悠，利深禍連……終於陵夷大運，淪亡神寶。

後漢書的作者范曄，生於南朝劉宋，也是男權高張的時候，從古文的說法，他根本否定女人從政，把母后臨朝，視為一種患、一種禍，而忽略母后臨朝



高宗死後葬於乾陵，武則天死後即合葬於此，此圖為乾陵遠眺。陵在今陝西乾縣西北五里的梁山。

的時機，還處在國君年幼無知，政治體系混淆，對這種混淆，從無一個朝代，以合理的制度，提供女人參政的機會，而疏解可能發生的禍患，使得中國史上一旦出現母后臨朝，往往禍患就跟著來。

限制女子從政，到了明朝，更發揮到極點。明史后妃列傳說：

明太祖鑒前代女禍，立綱陳紀，首嚴內教。洪武元年，命儒臣修女誠……后妃雖母儀天下，然不可俾預政事，至於嬪妃之屬，不過備職事，侍巾櫛……又命工部制紅牌戒諭后妃之詞，懸於宮中。

這等於斬絕女子從政的唯一機會，難怪中國人注意到女權問題，一直要到清朝乾隆時的李汝珍。

女人在古代政治地位上，既無法如男子縱橫捭闔，在社會生活上，亦往往附屬在以男人為中心的陰影下。

在西漢時期，我們可以看到男棄女另娶，也可以看到女棄男更嫁。

漢書就載有兩個女棄男更嫁的例子：

張耳傳——外黃富人女甚美，庸奴其父，亡邸父客，父客謂曰：必欲求賢夫，從張耳。女聽為請決嫁之。

朱買臣傳——妻求去，買臣不能留，即聽去。

在社會活動方面，西漢之女子職業，根據瞿宣穎的中國社會史料叢稱甲集所言，有刺繡、織履、巫、教授、相師、相馬、乳母。其範圍多限在戶內，間接說明屬於勞力型或工作場所在工作，多由男性擔任。這種現象應沿自春秋戰國以來的習慣，而婦女的生活空間既多侷限於戶內，活動力就打了折扣，在政治、經濟方面，自無法和男人一爭長短。

## 東漢之後逐漸突破「女誠」枷鎖

到了東漢，女子有了七誠的約束，經由婚姻附屬於男子的色彩更加鮮明，此時，不僅夫家有去妻之權，悍姑更是此時之陋俗，尤其女子喪夫守節的風氣，更為後來的婦女所師法。雖然，這種守節風氣在當時並非普遍，但是成了「烈女」的象徵，無疑對後代有重大的影響。

東漢之後的魏晉南北朝，由於時局動亂，易鼎頻繁，反映到女權的地位，與前朝並無多大的改變，但她們的社會生活却有很大的彈性，較以往的婦女，有較寬廣的空間，這種情形有如唐、宋之間的五代，只能說是中國歷史的特例，而非常軌。封閉的女權，必需透過動亂的時代，才獲得一點喘息的機會，是很令感嘆的。

這一時期的婚姻，在門當戶對的觀念下，並不限制女子的改嫁，婦女風氣甚至被認為十分敗壞。

昭明文造所錄的干寶晉紀總論說：

其婦女莊櫛織絲取成於婢僕，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，中饋酒食之事也。先時而婚，任情而動，故皆不恥淫佚之過，不拘妒忌，有逆于舅姑，有反易剛柔，有殺戮妾媵，有黷亂上下，父兄弗之罪，天下莫之非……豈法刑政，於此大壞。

這不僅顯示女子在家庭的地位，有相當的權威，婚姻的選擇，亦有程度上的主權，反映到社會活動方面，也遠非西漢，東漢婦女可以比擬。

瞿宣穎引「四朝聞見錄」指出南朝婦女知書能文者甚多：

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，乃知當時文風之盛，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、魏夫人、衛茂漪、謝道韞輩。又知古人教子，既使之外從師友退居于內，又使婦人之能文藝知道理者與之處，宜乎子敬為晉名臣也。

瞿氏並指出，當時的婦人也從事商業，凡此說明婦女由室內走到戶外，思想、觀念均逐漸突破女誡的枷鎖。如果這種觀念順流而下的發展，女權時代的來臨，不會等到民國以後，可能在唐、宋時期，女權就已在中國生根，那將會是世界上最早有女權的國家。

## 宋朝之後將婦女限於戶內

女權再一次受到嚴重箝制，是在宋朝。宋朝懲五代之亂，戒藩鎮之禍，立國政策重文輕武，儒家思想在這時候大放異彩，繼而發展出特有的理學思想，過去對女權壓抑的論說，均在此時發揚光大。

試看張載的橫渠女誡：

婦道之常，順為厥正，是曰天明，是其帝命，嘉爾婉之，克安爾親，往之汝家，克施克勸，爾順維何，無違夫子，無然臯臯，無然訾訾，彼是而違，爾焉作非，彼舊而革，爾焉作儀，惟非惟儀，女生則戒，王爾肅雍，酒色是識，貽爾五物，以銘汝心，錫爾佩巾，墨子誨言，銅爾提匡，謹爾賓薦，玉爾奩具，素爾藻絢，枕爾文竹，席爾吳筦，念爾書訓，思爾退安，彼實有室，遜爾提提，爾生引逸。

短短卅五句，一百四十個字，詰屈誨誨，所言無非要婦人順夫，不能有自己的意見，不能有任何創見，做好侍候丈夫的職責。這與班昭的女誡，用心上並無二致。不同的是，班昭以女人的感受寫下女誡，是以女人的立場呼籲女人應遵守這個規範；張載的女誡，則是以男人的立場，要求女人應遵守這個規範。在約束力方面，自然是以男人寫女誡，來得有效。

夏竦在「女懷清台銘」更進一步的指出：

國家之旌有四：曰貞曰孝以侑民也，曰功曰德以礪臣也，而婦誠閨戶預外事，是非貞也，圖貨殖忘盟饋，是非孝也，采丹石棄織紉，是非功也，抗君禮乖婦儀，是非德也。……銘曰：童年無角，牝雞無晨，陰不可唱，以己徇人。

這番話較張載的女誡更為露骨，根本把婦女的生活限定在閨房內，她們的責任是侍奉公婆、侍候丈夫、居家織布，不得有自己的職業，不能干預戶外的

## 順裏足是閨房文化的特色

宋代的女人，久居閨房，無聊之極，竟然發展出她們的閨房文化，裏足則是其特色之一。

裏足又稱扎脚，明朝陶宗儀的輟耕錄指出，扎脚自五代以來分為之，如熙寧、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，近年則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。

瞿宣穎引夷堅乙志——我以平生洗頭、洗足，分外用水及費纒帛履襪之罪，陰府積穢水五大甕，令自飲之——此則南宋婦女裏足極普通證。



纏足之痛苦，非現代人所能想像，李汝珍在鏡花緣寫男人纏足苦不堪言，其實說的是女人，不過是透過男人的呻吟來反映女人的痛苦。

林之洋兩隻金蓮被衆客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，並用藥水薰洗，未及半月，已將脚面彎曲，折作凹段，十指俱已腐爛，日日鮮血淋漓。

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，已是痛上加痛。及至將足吊起，身子懸空，只覺眼中金星亂冒，登時疼得冷汗直流，兩腿酸麻，只得咬牙忍痛，閉口合眼，只等早氣斷身亡，就可免了零碎吃苦，吊了片時，不但不死，並且越吊越明白，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，十分痛苦，咬定牙關，左忍右忍，那裡忍得住，不因不由殺豬一般喊叫起來……不知不覺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，業已流盡，只剩幾根枯骨，兩足甚覺瘦小。

女人纏足，受盡痛苦，無非是要取悅男性，在纏足的枷鎖下，活動力自然大打折扣，想與男性競爭，更是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。這對女人算是酷刑的風

氣，一直到清康熙三年下令禁止，瞿宜頌的中國社會史料叢鈔指出：

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員會議，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，其禁止之法該部議復等因，於本年正月內臣部議定，元年以後所生之女，若有違法裹足者，其父有官着交吏兵二部議處；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……查立法太嚴，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，爲元年以後，誣妄出首，牽連無辜，亦未可知，相應免其禁止，裹足自此弛禁。

## 比裹足更殘忍的是殉葬

這番定意頗善的德政，竟然遭到嚴重的阻力，最後弛禁，造成纏足乃婦女天經地義的事的觀念，對女權的突破，又是一次壓抑。

裹足雖然殘忍，畢竟還要不了命，較裹足更嚴重的則有殉葬。最早的殉葬可能有男有女。史記秦本紀說：

（秦）繆公卒，葬雍，從死者有七十七人，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息、仲行、鍼虎，亦在從死之中，秦之哀之，爲作黃鳥之詩。

在一七七名從葬者當中，有三名大臣特別被記述下名字，其他一百七十四位無名氏，想見有不少宮女。不過，當時的殉葬，是表示對君王的效忠，君亡隨之而亡。

以人殉葬過於殘忍，後來的皇帝，於心不忍，鴛鴦之後，多以明器取代活人。唯獨明朝不然，趙翼的廿二史劄記「明宮人殉葬之制」指出：

明史后妃傳，太祖崩，宮人多從死者，建文、永樂時，相繼優卹……歷成祖、仁、宣二宗皆然。其見於后妃傳者，宣宗崩，嬪何氏、趙氏、吳氏、焦氏、曹氏、徐氏、袁氏、張氏、李氏、何氏皆從死，正統元年皆追加贈諡……景帝以郕王薨，猶用其制，至英宗遺詔始罷之。案周王有熾傳，有熾死，英宗賜有熾書曰：王在日，嘗奏身後事務從儉約，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，年少有父母者遺歸云云。帝之徐殉葬，蓋本於有熾之奏也，然有熾死，妃鞏氏，夫人施氏、歐氏、陳氏、張氏、韓氏、李氏皆死殉，諡妃貞烈，夫人貞順，蓋帝賜書未到已先死矣。又可見當時宮人殉葬，各王府皆然，不特朝廷也。



這是多麼可怕的事，男主人一死，這些宮妃全部跟著死，她們活着是爲男主人而活，她們生在世界上就是等死，男主人一旦生病，不管心裡願不願意，要有就死的心裡準備。不只如此，身殉之後，後來的帝王還有獎勵，此一措施，明白的指出女人只是附屬於男人，女人何權之有。

## 在男人支配下的古代女人

事實上，中國古代的女人，一直活在男人的支配下，她們很難突破這種支配，除非遇到戰亂，戰爭之中，男人多赴戰場，製造了大批的孤兒寡婦，使得婦人爲了生活起見，在觀念上有所覺醒。一旦政治上承平，這種覺醒又被壓抑，每一次的壓抑，對女權的干預，多有顯著的升高，那時的女子要能自由獨立，幾無可能。

古代女子無法爭取到合法的權益，最大的障礙來自她們缺乏正當管道的教育制度，無法接受正規的教育。知識閉塞，父母在她們的教育扮演了重要角色，如果父親是文盲，她們文盲的機會極大，如果父親是個讀書人，女兒所學，多半是女誡之書，再不然就是詩、詞、歌、賦的吟頌。

我們看古代所謂的才女，學術作品極小，而女詩人、女詞人之流，作品多爲無病呻吟、不痛不癢的閨閣文藝。主要的關鍵，在於她們知識學習管道太過狹窄，能識字已不錯，何況作詩、填詞。

## 妓女文學的產生

在這種歧視的教育制度下，中國婦女文學史上，也發展出舉世特有的妓女文學，尤其唐、宋之際，文人狎妓成爲風氣，妓女在耳濡目染之下，知詩詞、通音律，更傳出許多感人的愛情故事，勿寧說是無心插柳的意外結果。

一位歷史家指出：

統觀兩性關係，自氏族時代以後，即已漸失其正常。其理由：因女子在產育上，所負的責任，較男子爲多，因而其競爭的力量，較男子爲弱。不論在人

類憑恃武力相競爭，或憑恃財力相競爭的時代，女子均漸淪於被保護的地位，失其獨立，而附屬於男子。

社會的組織，宜於寬平坦蕩，個個人與總體直接，若多設等級，使這一部分人，隸屬於那一部分人，那就不公平的制度，要逐漸發生，積久而其弊愈深了。



## 近代女權的申張

近代女權的漸漸伸張，實因工業革命以來，女子漸加入社會機構，非如昔日蟄居家庭之中，專做輔助男子的事情之故。

女子在產育上多盡了責任，男子就該在別一方面多盡些義務，這是公道。這個社會是兩性共存的社會，所謂公道，應是相互扶持、各自發展，也就是說，家庭制度是一個群體，但群體要促進個體的成長，才能達到群體的發展。

證諸中國婦女幾千年來，由壓抑到開放，由配角到主角，這段歷程艱辛異常，近代女權的發展，當珍惜眼前的成果，爲未來的婦女和整個社會發展作更適切的努力。

（本文作者爲名記者）